

党史资料

丛刊



第2辑



党史资料丛刊

一九八一年第二辑

(总第七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75 字数 141,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100

书号 3074·598 定价(六)0.58元

内部发行



2 023 3098 6

目 录

党史资料丛刊 目录

一九八一年
第二辑
(总第七辑)

回 忆 录

中 央 特 科

- 关于中央特科 陈养山(4)
中央特科一科的工作情况 洪扬生(18)

共青团中央、江浙区委等

- 江浙区委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 徐梅坤(24)
我在共青团中央和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
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黄药眠(29)
上海支援京汉路工人大罢工的点滴
情况 许德良(33)

抗日武装斗争

- 淞沪地委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些情况 ... 陈伟达(36)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 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工作 赵朴初(40)
职业界救亡协会和上海“孤岛”
时期的抗敌斗争 王纪华(47)

狱中斗争

一九三一年我在狱中知道的一些情况

及其他 李沫英(55)

瞿秋白 杨之华 林育南

回忆瞿秋白和杨之华 陈修良(59)

忆林育南烈士 陆若冰(64)

托派在上海的活动

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 赵 济(72)

专题研究

谈谈赣东北根据地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叶勤耕(95)

瞿秋白史事正误一则 陈铁健(104)

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日期、地点和

出席人数问题 曹仲彬(111)

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

“共产主义小组” 周子信(117)

罗亦农的出生年月和曾用名 金再及(121)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时间……黄少群(125)

平民女学 ……………王家贵 蔡锡瑶(129)

大 事 记

皖南事变大事记 ……………黄开沅 房列曙 郭桂兰(136)

人 物 介 绍

中共代表等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一)

……………向 青 石志夫 孙 岩(158)

革 命 报 刊 介 绍

《先驱》半月刊 ……………周尚文 贺世友(172)

《中国青年》周刊 ……………周尚文 贺世友(177)

封面装帧 范一辛



2 023 3098 6

目 录

党史资料丛刊 目录

一九八一年

第二辑

(总第七辑)

回 忆 录

中 央 特 科

关于中央特科 陈养山(4)

中央特科一科的工作情况 洪扬生(18)

共青团中央、江浙区委等

江浙区委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 徐梅坤(24)

我在共青团中央和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

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黄药眠(29)

上海支援京汉路工人大罢工的点滴

情况 许德良(33)

抗日武装斗争

淞沪地委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些情况 ... 陈伟达(36)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工作 赵朴初(40)

职业界救亡协会和上海“孤岛”

时期的抗敌斗争 王纪华(47)

狱 中 斗 争

一九三一年我在狱中知道的一些情况

及其他 李沫英(55)

瞿秋白 杨之华 林育南

回忆瞿秋白和杨之华 陈修良(59)

忆林育南烈士 陆若冰(64)

托派在上海的活动

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 赵 济(72)

专题研究

谈谈赣东北根据地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叶勤耕(95)

瞿秋白史事正误一则 陈铁健(104)

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日期、地点和

出席人数问题 曹仲彬(111)

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

“共产主义小组” 周子信(117)

罗亦农的出生年月和曾用名 金再及(121)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时间……黄少群(125)

平民女学 ……………王家贵 蔡锡瑶(129)

大 事 记

皖南事变大事记 ……………黄开沅 房列曙 郭桂兰(136)

人 物 介 绍

中共代表等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一)

……………向 青 石志夫 孙 岩(158)

革 命 报 刊 介 绍

《先驱》半月刊 ……………周尚文 贺世友(172)

《中国青年》周刊 ……………周尚文 贺世友(177)

封面装帧 范一辛

关于中央特科

陈 养 山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过去，北洋军阀不了解我们党的秘密工作和革命活动，而国民党知道我们秘密活动的一些方法。所以，要在上海重新建立中央机关，不那么容易。但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好隐蔽，沪东发生问题，可搬到沪西去。此外，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住房易找，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便于掩护。过去工作基础好，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工人群众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党中央机关不仅能够设在上海，能够存在下去，而且比任何大城市的条件都要好。

上海的敌情也很复杂。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有外国的海、陆军，有英国、法国、印度、安南等国的巡捕；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有军队、警察、宪兵、特务机关等等。另外，还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一帮流氓势力，他们既为国民党服务，又为帝国主义服务。因此，在上海这个敌人统治的中心，要进行革命活动，保障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没有党的政治保卫工作是不行的。

一、中央特科的建立

一九二七年八月以后，党中央机关陆续搬来上海。十一月间周恩来同志调回到上海党中央，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春，中央军委办了一个学习班，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坚持白区的斗争，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由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讲课。在武汉时期，中央军委曾设立过“特务工作处”，惩处了一些内奸、叛徒。周恩来同志回上海后不久，就筹建了中央特科，为保卫党中央和上海的党组织作出了贡献。

党中央在上海设立各种领导机关，需要有一个专门组织来负责采购布置机关的用具。这个组织开始时叫“总部”，而后成为特科的一科。找房子、办家具、建立联络点等统一由一科办理。为了租房子打铺保的方便，还开设了些店铺，如木器店等。

为了掌握敌情，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建立了情报组织，也即特科的二科，科长是陈赓。没有深入敌人内部的工作，不了解敌人动向，什么都保卫不了。二科建立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发展比较快，也比较顺利。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二科的工作一是打进去，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部门，向国民党的特务、军队、警察、宪兵机关，以至帝国主义的巡捕房，派去我们的人员，搞情报工作。除了派党员打入敌人内部，我们还利用同情我们、又为我们信任的人，打入敌人特务机关，为我党工作。二是拉出来，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出来。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联系方式。我们同上海的一些流氓帮派也有关系。

在敌特机关中，都有我们的同情者以及可利用的关系。敌人

的阴谋计划，我们能够了解；敌人要逮捕我们的人，我们事先知道了，敌人几次要破坏我们中央机关，都失败了。一九三一年前，党中央机关没有什么大的破坏。彭湃的被捕，事先也得到了情报，但迟了一点，来不及通知，如情报早到一些，就可以避免了。

镇压特务、叛徒是保卫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九二八年四月，罗亦农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牺牲，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特科设立了三科（较早成立的“红队”在中央特科建立后，作为特科的三科），专门搞“打狗”（镇压叛徒、特务）的工作。

一九二九年以后，由于红军的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发展，原来的交通来往时间太长，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发展，中央迫切需要和各苏区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于是，特科又设立了四科，由李强负责。一九三〇年红军攻打长沙时，无线电通讯工作初步搞起来了。

这样，中央特科根据工作的需要逐步建立了四个科。

二、关于鲍君甫

国民党建立特务机关，大概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三、四月间，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这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关。第一任科长是张道藩，第二任科长是陈立夫。

调查科成立后，在南京设立了调查科总部。不久，总部派杨剑虹到上海筹建特务组织。杨剑虹是广东人，五卅运动时是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以后跟国民党右派走了，思想十分反动。杨在五卅运动中认识另一广东人鲍君甫，成为知交，两人无话不谈。鲍曾留学日本，“五四”时回国，在日本洋行工作过。鲍社交很广，与日本通讯社、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一些要人都有来往，同我们党也有来往。鲍原来住在上海大学附近，与“上大”的很多人相识。鲍加入过

国民党左派，“四·一二”时被蒋介石逮捕，后由国民党人保释。

我与鲍君甫是在一九二六年春认识的。当时，通过一个同志介绍，我到鲍君甫处学习日文。一九二八年春节后，我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到上海没有地方住，就住在鲍君甫家里。当时，杨剑虹经常到鲍家来，鲍把杨的情况对我讲了，并问我怎么办好，我说保持这个关系很好。有时鲍还告诉我一些敌人方面的消息。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杨来时就叫我回避。

杨要抓什么人，告诉鲍，有时还带鲍去。杨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等机关去，经常带鲍去。以后，张道藩、陈立夫来上海，鲍都接待他们。

不久鲍提出来：杨剑虹要他为国民党搞特务工作。他要我同党商量一下，看行不行？当时，我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我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可以利用。不久，陈赓找我谈话，详细研究了鲍的情况，认为这个人基本上是倾向我们的，是可以用的。陈赓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后，一九二八年五月，陈赓就同鲍见面。不久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

当时，鲍君甫因经常陪杨剑虹、张道藩出入公安局、巡捕房等需要一部小汽车，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我们又给他配了一个保镖，叫连德生。连原是电车公司买票的，五卅运动时很有名，以后去过苏联，苏联回来后调来特科工作。连是党员，实际上是党组织和鲍之间的联络员。连每天陪着鲍到处跑。从此以后，鲍君甫这个关系就由陈赓直接领导，有些事交给连德生联系办理。我也离开了鲍的家。

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鲍君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用的假名是杨登瀛。从某种角度看，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是由我们

替它配备人员的。

鲍的活动范围很广。当时英国巡捕房的政治处主任劳伯森，认为鲍是一个专家；与鲍的关系很好，什么情况都告诉鲍，有疑难问题都找他商量，他那里的材料，鲍都可以看到。有时巡捕房抓人，鲍也去。鲍把各种情报及时交给我们，因而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英捕房的情况。为了和劳伯森搞关系，鲍君甫取得我们同意后，给劳伯森送了不少东西，还给他送了一部汽车。

鲍当特派员以后，我们一方面利用鲍的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中去；另一方面尽力巩固鲍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有的叛徒，我们通过鲍说是假叛变，与共产党仍有“勾结”，借国民党的手搞掉叛徒。有时我们布置一些假机关，让敌人去破坏。

有了情报工作，有了这些关系，对保卫中央机关，保卫上海的党组织，打击敌特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〇年任弼时被捕后，我们通过鲍去营救。鲍对巡捕房说任是他手下的人，使任很快获得释放。关向应被捕时，抄去很多机密文件。我们让中央特科的刘鼎伪装成鲍特地请来的专家，专门去鉴定文件的真伪。通过刘鼎的“鉴别”，把重要文件都拿回来了。不久，关向应也被释放。

鲍君甫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间给我们做了不少工作，顾顺章叛变后，敌人知道了这个关系。一九三一年四月底他被国民党逮捕，但他什么也没有讲。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国民党把他放了出来。一九三四年以后，他当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南京解放时，他在南京摆小摊头，生活困难。一九五一年镇反时，我们把他抓了起来。周总理、陈赓知道后把他放了出去。因他生活无着，我们每月给他一些帮助。“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斗得厉害，一九七〇年初去世。

三、关于钱壮飞

钱壮飞曾在北京当过医生和教员，他多才多艺，能字善画，还拍过电影。他在北京时认识了胡底，经常往来，二人相处很好。钱壮飞入党后在北京的活动日益暴露，站不住脚，于一九二八年离开北京，到河南冯玉祥部队当军医。以后，他又到上海。胡底也因在北京站不住脚，到了上海。经胡底介绍，钱不久认识了李克农。

国民党上海无线电报局招考，钱壮飞报名应考，成绩优异，被录取了。电报局长徐恩曾和钱是浙江湖州同乡。徐恩曾见他才艺超人，要他当自己的秘书。钱壮飞很能干，很快得到徐的信任。

钱壮飞有了这样的地位，通过李克农找中央特科，告诉中央有这个关系可以打进国民党内部工作，周恩来同志同意他们打进去，要钱做徐恩曾的助手，取得信任，为党工作。一九二九年，陈立夫调徐恩曾（陈的表亲）担任调查科主任，这样，徐的权势就更大。调查科设在南京，徐恩曾把钱带到南京，做他的机要秘书。我党中央又把李克农调到南京，配合钱壮飞工作。钱壮飞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全国大城市（北平、汉口、天津等地）办通讯社。胡底曾任天津通讯社社长。

钱壮飞工作条件很好，钱、李、胡相互配合，收集了很多国民党军事、政治、特务等情报，了解了国民党的动向。这一时期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徐恩曾有个密码本，一直随身携带，不交给钱壮飞。有一天，徐恩曾要去请客，钱就对他说，你带了本子去赴宴不方便，找个地方把它封起来。徐就把密码本交钱封存保管。于是，钱乘机搞到了密码。

李克农在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回上海。钱壮飞的女儿、女

婿去南京当交通，有重要情报由钱的女婿送交上海党中央。这三个人(钱、李和钱的女儿)相互配合，密切联系。

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回到武汉。顾在武汉耍魔术，化名叫“化广奇”，演了好几天。顾顺章早就生活腐化，周恩来同志曾多次批评过他，派他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实际上是把顾调离特科。

武汉有个党员被捕后叛变，国民党特务机关限他一星期内找出共产党，否则就要枪毙。他天天在武汉街上东逛西窜。最后一天，他在新世界游艺场，发现演魔术的是顾顺章。他是在武汉搞纠察队时认识顾顺章的。他立即对跟着的特务说，这个人(指顾顺章)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戏散场后，国民党特务钉梢到顾顺章住的地方(顾住在汉口法租界)，当天晚上没有下手逮捕。第二天，特务先跟着他到武昌，再跟顾顺章回到汉口，当晚就把他抓住了。逮捕后，顾顺章被解押到湖北绥靖公署何成濬那里，何如获至宝。当晚，审问时顾即叛变，并讲了三条：一、赶快送他到南京去，要面见蒋介石，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和机关；二、要保密，不要打电报给南京；三、保护他的安全。

何成濬邀功心切，拍电报报告了南京。南京特务机关本想派飞机，派不出，派了一艘军舰，把顾顺章接到南京。

何成濬拍的电报到达南京时，巧遇星期六晚，徐恩曾不在机关。钱壮飞拆阅电报后，知道顾顺章被捕叛变，事关重大，心急如焚。他先叫女婿去上海报信，自己沉着处理好手中的事情后，乘火车赶回上海，在郊区站下车，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李克农和陈赓，很快把顾顺章被捕叛变的重要情报告诉了周恩来同志。

在周恩来同志勇敢沉着、果断机智的指挥下，中央机关迅速搬家。有的同志马上隐蔽起来；有的转移，有的撤到苏区去(如李克农、钱壮飞等)。从此，周恩来同志的活动条件更加困难，不能经常

出来了。粉碎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破坏活动，这是共产党保卫工作的重大胜利。

顾顺章投敌叛变后，为国民党敌特机关献计献策。他提出自首政策，规劝被捕的共产党人投敌，搞秘密自首和公开自首。有的又派回到党内来，充当奸细。以后我们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同顾顺章提出的自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中统、军统特务机关都把顾顺章当作反共的宝贝，相互争夺。后来，顾顺章写了一本《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他投靠国民党、反共到底的资本。这样，顾顺章在特务中身价百倍，地位步步高升。顾顺章这个人野心很大，想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另组织一派以叛徒为骨干的特务力量，还没有搞成，就被国民党发觉了。一九三五年，中统把顾顺章搞掉了。

四、“红队”的成立与整顿

“红队”也叫“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它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为保卫党中央、保卫上海地下党的安全，打击国民党特务，镇压叛徒、内奸，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屡建奇功。

“红队”的产生，有一个过程。它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逐步形成的。一九二五年“五卅”大罢工爆发后，各工会系统为了维持罢工秩序，防止工贼、流氓的破坏，纷纷组织起工人纠察队。当时一般千人左右的工厂都有一支从几十人到一、二百人的纠察队，队员从工会积极分子和党、团员中挑选。纠察队除维持本工厂、企业的罢工秩序外，还负责调解工人群众内部的纠纷，纠察队是工会的一个重要部门。

一九二五年六月下旬，工人罢工已有二十多天，帝国主义及其各种走狗，加紧了对罢工的破坏。他们一方面利用部分工人罢工后生活发生困难，挑拨离间，企图分裂工人队伍；同时又利用流氓、

工贼,有组织、有计划地袭击罢工的领导人、工会负责人和积极分子。有的同志甚至被他们秘密打死或打成重伤。

针对这种情况,党组织和工会一方面积极设法帮助有困难的工人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同时,对破坏罢工的流氓、工贼,视其情节轻重,或提出公开警告,或给予坚决回击。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不听警告继续作恶的工贼,我们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枪的同志,担负镇压流氓、工贼的工作。我们干掉这些作恶多端的人,工人群众是拥护的,社会上也是同情的,其结果,反击了敌人的阴谋,巩固了罢工斗争。

从“五卅”时期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纠察队是没有枪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时,我们先缴了警察局的部分枪支,后来又缴了军阀部队的一些武器,纠察队就武装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问题更复杂了。不仅流氓、工贼的问题继续存在,又有了要对付国民党特务,党的叛徒、内奸等问题。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叛徒知道我们的活动规律,对我们的威胁更大,跟他们的斗争也更艰巨。特别是六月份,江苏省委机关新成立,在一次省委会议刚刚散会后,就遭国民党特务包围,造成陈延年等同志被捕。此后,又因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叛变,造成赵世炎被捕。陈延年、赵世炎两同志被捕牺牲的血的教训,使我党深感要有一些专门的同志来对付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叛徒的破坏。于是,在原来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由江苏省委选了政治上坚决、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同志,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镇压特务、叛徒、内奸的任务。

在周恩来同志从香港回到上海时,中央机关已陆续从武汉搬到上海。在武汉来的同志中,也有专门做这一方面工作的。这样,上海就有两批同志专做“打狗”的工作,分别属于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